

作者在書中似乎並未明示。此外，如黎力基、何必烈、梅輝立（W. F. Meyers，又譯作「梅輝拉」）等人均論及客家歷史源流，其與歐氏的觀點有何差異，敘事模式有何不同，亦值得進一步研究。

其二，部份觀點仍值得細緻推敲。在作者看來，歐德理運用民間史料分析客家源流的研究路徑為羅香林所承襲，「其推理邏輯與歐德理完全一樣，甚至可說只是在歐德理的框架上進一步補充材料而已」（頁43）。比較羅香林的《客家學導論》與歐氏的客家民族志，二者在敘述客家源流之時，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羅著在回顧客家研究史時，不僅提及歐德理（羅譯作「哀德爾」）的〈客家人民族志略〉與〈客家歷史大綱〉等域外客家研究著述，亦提及徐旭曾、黃釗等客家知識精英的客家歷史書寫。如上著述中的客家源流敘事，基本邏輯均是客家先民自北方遷來，承傳中原舊俗，方言保留中原古音，且多在開篇解釋「客家」為何得名。若說羅香林受到歐德理敘事框架的影響，恐怕仍需更多的證據。

儘管如此，這書為學界揭示客家研究的域外之源，填補研究空白，使得客家研究學術史的整體面貌更加完整清晰，是一部集理論性與資料性為一體的著作。這部著作無疑豐富客家研究的知識系譜，為研究海外客家學術史提供新的增長點。

李瑞璞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費晟，《再造金山：華人移民與澳新殖民地生態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472頁。

作者廣泛利用澳大利亞官方檔案、中外民間史料、口述史及物質文化研究成果，從移民環境史的視角詳盡考察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紐西蘭的生產生活，特別是華人移民參與農牧礦產業以及與歐洲移民群體互動的細節，揭示華人對澳新殖民地生態與社會變化的影響與意義。本書的重要觀點是，近代中國利用英帝國的貿易網路與南太平洋地區產生經濟和生態聯繫，隨後的華人移民則強化這種聯繫，使中國因素更直接有力地參與南太平洋地區生態與社會的整體變遷，而華人強大的環境適應性和改造力也刺激歐洲移民的生態焦慮，這最終加速種族主義的排華話語及政策在殖

民地的興起。

儘管本書的研究對象是華人移民，它卻並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華人華僑史作品」（頁5）。借助環境史的視角和方法，本書開創性地將華人移民視為一種流動的生態群落，強調南太平洋地區新歐洲生態體系的構建不僅是西方殖民的產物，也凝聚華人的經驗與技術，所謂的新歐洲景觀其實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產物。從生態維度切入，該書論證全球史視野下澳、新華人移民研究的重要性和創新點：從淘金熱中華人應用水利技術和果蔬種植的獨特優勢，到華人資本驅動的工礦、種植業的蓬勃發展，一個個生動案例，展現的不是華人移民如何逆來順受，而是積極實現自我價值，突破讀者以往對華人總是受苦受難的單調印象，揭示傳統上被忽視的華人移民的生態影響力。由此，澳、新移民新生態的構建，不應再被視為白人移民主導的進程，而是「包含着多元文化移民的努力」（頁17）。

在此基礎上，作者並不滿足於講述華人移民造成的海外社會與自然環境變化，而是對澳、新兩國歐洲移民優勢地位和長久奉行的種族歧視政策溯源，引出更深層次的問題，即華人移民非凡的環境適應性和改造力為什麼不能轉化成對澳、新移民新生態的主導權。這個現象的根源，恰恰在於歐洲移民「對華人移民生態優勢的忌憚」（頁34），只有通過不公平的社會制度的壓制才得到緩解。書中着重敘述淘金熱時期歐洲移民礦工在面臨自然資源瓶頸時，不斷指責華人浪費水源、不講衛生、威脅全民身體健康等，將自身的生態焦慮落實為強有力的排華輿論和制度。從上述角度考察反華意識形態的建構機制，本書修正「生態帝國主義」理論解釋歐洲移民生態優勢時慣用的「西方殖民主義與原住民衝突互動的二元分析框架」（頁39），揭示多元移民社會中歐洲移民的生態霸權與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的互動關係。在這一點上，本書與移民環境史研究的先鋒著作《塵暴》一樣，克服「生態與社會的二元劃分」（Marco Armiero and Richard Tucker,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Modern Migrations*, NY: Routledge, 2017, p. 3），而這種克服對於研究移民尤為關鍵。

不僅如此，在組織華人移民的生態影響力及其引起的生態焦慮這兩方面敘事時，本書巧妙營造互為因果的交織敘事，而非由因到果的單向邏輯。縱向來看，華人移民的生態影響力與歐洲移民的生態焦慮存在一種微妙的平衡，例如淘金熱時期華人礦工遭受的排斥促使其轉向蔬果種植園經營等多樣化的生計，反而強化與歐洲移民的交流與合作，使自身更緊密地融入移民社會，長遠來看這更加導致歐洲移民的警覺。橫向審視，同一時期不同殖民地

社會對華人移民生態的態度並不相同，例如，由於澳、新淘金熱爆發和社會發展的不同步，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業已引起歐洲移民排斥的生態優勢，反而得到紐西蘭的青睞，而同在澳大利亞，白人難以開發的熱帶昆士蘭也為華人移民提供更為自由的營造新生態的機會。

總的來說，此書從移民環境史的視角將傳統研究中地緣位置較為次要的澳、新歷史寫出新意，以全球史視野下多元移民社會的複雜互動機制，回應「生態帝國主義」解釋框架的老問題。對華人移民的再認識，意味着對澳大利亞、紐西蘭史學界綿延至今的民族主義敘事祛魅：澳、新之所以變成新歐洲，其實不光是歐洲人消滅原住民文明的結果，更是因為歐洲移民對其他移民競爭者開展的持續且不擇手段的壓制，這一切最終表現為一種淡化華人存在感的歷史敘事。任何移民群體只要對已經主導政治和暴力資源的人群造成挑戰，都難逃被排斥的命運。因此，本書以一種並不輕鬆的筆觸作結：「對這一點的反思或許值得長期堅持，因為用一種生態威脅的話語將特定移民群體妖魔化的邏輯仍然在我們這個世界不同的角落不時浮現」（頁412）。

囿於篇幅和典型性，本書主要關注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東部幾個殖民地和紐西蘭南島的活動，並將敘事下線定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新華人移民遭到全面排斥之時，在敘事的時間和空間跨度上仍有較大的拓展空間。即便在澳、新進入「永久性限制華人移民入境的時代」（頁391），考察華人移民如何頂着歐洲移民霸權的壓力、在夾縫中推進新生態的營建，也是有助於突出本書主題的重要內容。此外，本書在回應華人移民研究、生態擴張理論、澳新史學的重要問題之餘，如果能結合研究主題對移民環境史作進一步的評析，將有助於讀者更好地把握本書的定位和學術貢獻。

李星皓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侯深，《無牆之城：美國歷史上的城市與自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00頁。

對於生活在現代的人們來說，城市是人類生活的環境，然而早期的城市史研究卻很少將城市視為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環境。自城市環境史誕生後，這種情況發生巨大的改變。在喬·塔爾(Joel Tarr)、馬丁·麥樂西(Martin